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

主 编 雍际春 副主编 霍志军

LAIMU DE SHENG CUN



 来母的生存
——见母、来母古或同纽

 马建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

主 编 雍际春 副主编 霍志军

LAIMU DE SHENG CUN



 来母的生存
——见母、来母古或同组

马建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母的生存: 见母、来母古或同纽 / 马建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5003 - 0

I. ①来… II. ①马… III. ①汉语—上古音—韵母—研究 IV. ①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479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53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1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陇右文化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陇右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及主编名单

编委会主任 田 澍

编委会委员 侯甬坚 张德芳 薛正昌 吴 毅
陈逸平 雍际春

丛 书 主 编 雍际春

丛书副主编 霍志军

总 序

大千世界，万象竞呈。因区域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在中国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彰显着各地人们的文化气质。燕赵、齐鲁、巴蜀、三秦、荆楚、吴越等文化已广为人知。这其中，陇右文化更是因其所处的农牧交错、华戎交汇与南北过渡的区位优势，成为我国地域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具有迷人的风采，散发着瑰丽的芬芳。

陇右文化源远流长。若从原始人类遗迹来看，从陇东华池县赵家岔、辛家沟和泾川大岭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8万年前的“武山人”遗迹的发现，已昭示着陇右远古文化的曙光即将来临。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天水地区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等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早期遗存，翻开了陇右文化源头的第一页。继之而起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类型，在多样化农业起源与牧业起源，中国最早的彩陶与地画、文字刻画符号、宫殿式建筑、水泥的发现，最早的冶金术和铜刀、铜镜与金器的出土，礼仪中心的出现，表明等级身份的特殊器具玉器的发现，贫富分化与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的出现等，这一系列与文明起源相关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既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提供了佐证、增添了异彩，也是黄河上游地区开始迈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齐家文化之后的夏商之际，西戎氐羌部族广泛活动于陇右地区，并与中原农耕文化保持频繁的接触与交流，开创了农耕与草原文化相互介入、渗透和交融创新的文明模式。与此同时，周人起于陇东，秦人西迁并兴起于天水，陇右成为周秦早期文化的诞生地，并奠定了陇右以华戎交汇、农牧

结合为特征的第一抹文化底色。自秦汉至于明清，陇右地区民族交融不断，中西交流不绝，在悠久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互补、尚武刚毅、生生不息的地域文化特质。这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元素，成为华夏文化中最具活力的基因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夏文明的传承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在国内各地域文化研究如火如荼、成果层出不穷，地域文化与旅游开发日益升温的形势下，陇右文化的研究却相对冷寂，只是在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其中，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们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2001年，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学校陇右文化研究爱好者共同努力下，国内唯一的陇右地域文化研究学术机构——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心以开放的管理方式，以学校内部的学术力量为基础，广泛联系省内外的科研院所和相关文博专家，同气相求，共同承担起陇右文化学术研究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重任。以期中心的研究成果庶几能为甘肃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中心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2个春秋。12年里，我校的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一是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初步构建了陇右文化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为陇右文化研究和知识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催生和形成了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将科研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使陇右文化研究工作迈上可持续发展有了基础保障。三是2010年中心被确定为甘肃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搭建了平台。四是汇聚和成长起一支富有既充满活力又富有潜力的学术研究队伍。五是通过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长期开办“陇右文化研究”名牌栏目，编印《陇右文化论丛》连续出版物和出版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丛书”，为研究和宣传陇右文化营造了一块探索交流的学术阵地。在此基础上，产生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在推进学科建设，服务甘肃文化大省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2010年，学校为了进一步加大对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的扶持力度，将陇右文化重点学科建设作为重大项目，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经费，并得到资助，这为陇右文化研究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费保障。由此我们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先后启动了项目研究、

著作出版和资料购置等计划。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陇右文化研究丛书”，即是著作出版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深知，陇右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但许多领域的研究几近空白，基础研究工作亟待加强。所以，对于“丛书”的编写，我们秉持创新的理念，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提倡作者以陇右地域文化为研究范围，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长，自拟选题自由探讨。只要有所创新，成一家之言，不限题材和篇幅，经申报评审获得立项后，即可入编“丛书”。

经过各位作者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和创造性劳动，“丛书”按计划已基本完成。入编“丛书”的著作，涉及陇右文化研究的各方面，主要包括始祖文化、关陇文化、陇右文学、杜甫陇右诗、陇右旅游文化、陇右石窟艺术、陇右史地、陇右方言和放马滩木板地图等主题。各书的作者均是从事陇右文化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骨干，其中既有多年从事陇右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才俊。因此，“丛书”的出版，无疑是我校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最新进展与成果的一次整体亮相；也必将对深化陇右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深知学海无涯，探索永无止境，“丛书”所展示的成果也只是作者在陇右文化研究探索道路上的阶段性总结，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欠缺。作为引玉之砖，我们希望并欢迎学界同仁和读者多提批评指导意见，激励我们做得更好，以推动陇右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丛书”出版之际，正值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启动实施之时。这一发展战略确定了围绕“一带”，建设“三区”，打造“十三板块”（简称“1313工程”）的工作布局。“一带”就是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三区”为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和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十三板块”即十三类文化发展与资源保护开发工作，分别为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古籍整理出版、红色文化弘扬、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打造、文化队伍建设、节庆赛事会展举办等。这一战略以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平台，对加快甘肃文化大省建设，探索一条在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及其实施重点，也就是我们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主旨所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服务社会是高校所肩负的神圣职责。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为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也为我院陇右文化研究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充分利用陇右文化研究基地这一平台，发挥人才和学术优势，积极参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甘肃省文化大省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奉献智慧。我们相信，我校的陇右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无疑将在这一战略实施中大显身手，发挥排头兵的作用；也必将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中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学科生长点。

祝愿本套丛书的出版为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增光添彩！

雍际春

2013 年春于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

凡 例

一、本书所引《说文解字》，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书局影印的“大徐本”《说文》（1963年12月第1版，1983年8月印刷）。部分内容酌参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古代《说文》大家的著作。

二、中华书局影印的《说文解字》（大徐本）没有标点符号，故引用时以现行标点符号点读，并将原小篆字头改为楷体。

三、由于《说文解字》用字情况复杂，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及理解上的混乱，故凡是涉及许慎说解的内容均照原文收录，字形一仍其旧，以保存原貌，不苛求强改为简体字形。例如：“驗，馬名。从馬，僉聲。”“儼，昂頭也。从人，嚴聲。一曰好兒。”至于徐铉反切注音部分，由于其不涉及字形分析、字形比较等，一般改为通行简体字形。例如：“𩚑”，徐铉作“魚檢切”，今简化作“鱼检切”；“𩚑”，徐铉作“魚舉切”，今简化作“鱼举切”。正文其他部分用字也尽量使用现行规范用字。

四、本书记音符号采用的是通行的国际音标（大体上接近宽式音标），音标外一般加“[]”。例如：“癩蛤蟆”[kai⁵⁵xuo³⁵mA] / [lai⁵⁵xuo³⁵mA]、“牛”[tɕiəu³⁵]。有时为了节省篇幅，国际音标符号集中陈列时不加“[]”。例如：k、k'、x、tɕ、tɕ'、ɕ、ŋ、s、z。

五、引用或参考其他文献材料时，一般在引文后以脚注方式标注所自文献的作者、名称、出版信息、页码等；脚注号码以带圈数字排列，每页重新编号。当页第一次出注时标明书名、出版信息等情况后，再引用时只标明书名、页码。如标：“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当页再次引用该书时，仅标：“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第90页。”

六、关于部分汉字古代音读的拟测，由于前贤们的观点多有参差，故本书尽量择善而从。另外，本书对于所征引的拟测音读，有时会在记音符号的左上角加注“*”。例如：降* grǎng、隆* rǒng、瓜* rwrag 等。

前 言

当我们在上古——其实是秦汉为主——见、来二母进行考察后，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观点：即上古时代见母、来母或同组。但是说实在的，总体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来母与非见系声母相谐的情况，我们就没有一个更好的解释，而只是从对它们进行多个方面的对比，以及发现它们与甘谷话这个现活鲜活的方言实际相乖违，便得出结论，指认为是一种韵母相近而谐或偶然现象，或者是当时有些不同声母可能听起来比现在更相像造成的，因为那时毕竟没有现在这样的审音能力，也没有更加直接的材料。

我们通过对古代谐声关系的考察，并结合了现代甘谷方言的特殊材料进行了研究和梳理，认为上古时代可能浊音比较多，后来在清音化运动中逐渐失去优势，终于形成了今天这样清声母占优势的汉语状况。在不同声母相谐的认识上，比较倾向于认为上古没有复辅音。这一点我们更加相信王力先生的观点。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认为：“上古有没有复辅音？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谐声系统上看，似乎有复辅音，但是，现代汉语为什么没有复辅音的痕迹。人们常常举‘不律为笔’为例，但是，‘不律为笔’只是一种合音，正如‘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不可为叵’一样，我们不能以此证明‘笔’的上古音就是 [p^hliet]。一般拟测上古的复辅音，都是靠谐声偏旁作为证据的。”

我们在考察时，除了注意到谐声关系的广泛现象外，还特别关注了这些谐声关系的字所集中的声纽、及其相互间的字数比例（亦即音节数比例），认为存在于有些声母中的少数谐声，完全可能是偶入或者声音听起来相近造成的，而见系与来母之间却可能是特别的，他们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在论证时我们除使用了现代甘谷话中的语音标本，还参考了中

的只占了极少数。这与我们的考察结果一致。

我们也注意到了天水方言中的一些零散材料，如“癞蛤蟆”，本地原本读作 [kal⁵⁵xuo³⁵mA]，现在两读，作 [kal⁵⁵xuo³⁵mA]、[laI⁵⁵xuo³⁵mA]，是见母与来母关系紧密的材料，而且是很不容易才保留下来的，因为今天的天水话，已经基本没有读“癞”为 [kal⁵⁵] 的音，只是在引用古谚时才被记起来，如“癞蛤蟆支桌子”。（“蛤”读作 [xuo³⁵] 是现代天水话的基本读法，其他作如此读的，还有“禾”“喝”“河”等，韵母都作 [uo]，不作 [ɣ]、[ə] 一类）。

我们也注意到了今甘谷话中的另外一种现象：[k]、[l] 交替使用，有复辅音退变之形。如“埂”有 [ken⁵⁵len/lan]、[len³⁵ken] 二音，（甘谷话韵母韵尾前后鼻音不区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甘谷话曾经可能存在 kl- 一类的复辅音。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其他也还有“壳”[k ‘ang²¹⁴lang]、“角”[ke²¹⁴Iao]、“孔”[k ‘u²¹⁴long]、“轮”[ku²¹⁴lu] / [kun²¹⁴lun]、“滚”[kang²¹⁴lang] 等，但是这样的用例实在太少，不能作为一个结论性观点——上古可能存在复辅音声母——的证据，倒是这些例子却能表明见、来二母关系特别密切。

但是，复辅音也罢，单音素声母也罢，大家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这些材料证明，如果从汉字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来母字和见母字，在上古可能是属于同一个类的（我们称为古见母，拟为 [G]），只不过这个声母的音质，存在着它是一个单音素声母还是复辅音、单音词还是复音词的争论（古代汉语的单音词，后来转变成复音词，是很常见的，只不过这一些词恰好与我们所说的见、来二母的关系之争有形式上的类似，例如民—人民，前一前进、前后、前面，河—黄河，江—长江，等等，我们并不能由此怀疑这些复音词是曾经的复辅音的遗留）。

甘谷话是一种很有特点的方言。有一些材料极其难得。例如有关合口呼与撮口呼的关系一类：

例字	像山镇	磐安镇	礼辛镇
醋	[tɕ ‘jv ⁵⁵]	[ts ‘u ⁵⁵]	[tɕ ‘y ⁵⁵]

续表

例字	像山镇	磐安镇	礼辛镇
粗	[tɕ 'jv ²¹⁴]	[ts 'u ²¹⁴]	[tɕ 'y ²¹⁴]
促	[tɕ 'jv ²¹⁴]	[tɕ 'u ²¹⁴] / [tsu ²¹⁴]	[tɕ 'y ²¹⁴]
素	[ɕjv ⁵⁵]	[su ⁵⁵]	[ɕy ⁵⁵]
俗	[ɕjv ³⁵]	[ɕy ³⁵]	[ɕy ³⁵]
酥	[ɕjv ⁵¹]	[su ⁵¹]	[ɕy ⁵¹]
苏	[ɕjv ²¹⁴]	[su ²¹⁴]	[ɕy ²¹⁴]
宿	[ɕjv ²¹⁴]	[ɕy ²¹⁴]	[ɕy ²¹⁴]
诉	[ɕjv ⁵⁵]	[su ⁵⁵]	[ɕy ⁵⁵]
速	[ɕjv ²¹⁴]	[su ²¹⁴]	[ɕy ²¹⁴]
卒	[tɕjv ³⁵]	[tsu ³⁵]	[tɕy ³⁵]
足	[tɕjv ²¹⁴]	[tsu ²¹⁴]	[tɕy ²¹⁴]

研究证明，中古合口呼介音 [u] 前出现了 [i]，才促成了三四等韵。“现在我们将这一观点倒过来，来理解现代汉语的 ü [y]”，其形成过程应该解释为 [i + u] 的逐渐结合。李无未先生认为：“据古代等韵学家的研究，古代汉语中的韵母只有 [i]、[u] 两种韵头，而没有 [y] 韵头，但是在古音里，[i] 和 [u] 可以同时作韵头。由于语音演变，以 [i] [u] 同为韵头的合口韵，就演变为撮口呼。”（见李无未《汉语音韵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如果这种观点是可靠的，甘谷话上述用例就是十分难得的例语：在同一个语言平面上，在一个方言小区域里的不同城镇，对同一个概念同一个词（字）用不同的音（韵母）来标志，可贵的是这些不同，竟然与汉语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语言特征相互印证——磐安话可能最早，保留着宋以前的读音，像山镇——实际上就是县城周围——保留着唐宋时代的读音，而礼辛镇则说着宋以后的读音。据高本汉的调查和研究，如“祝”（祈祷），在公元 500 年左右时读作 [tɕiuk]（见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商务印书馆）。高本汉氏对西北方言极为熟悉，我因此很怀疑这一拟测是他受到类似甘谷方言“祝”读法（甘谷话读作 [tɕjv²¹⁴]）的启发而成。我们觉得高本汉的这种推断，现在在甘谷话中有对应的保留标本。从音质上看，上表中这些读音，读作 [u] 介音的应该

是比较早期的，而 [jv]（亦即 [iu] 介音的变化形式）的应该是中期的，而介音 [y] 当然是很后面的成果。从进程上看，[jv] 似乎是从 [u] 向 [y] 介音形成的过程性状态。唯一不一样的是，这些现象，在甘谷话中主要存在于一二等韵。

这是很有意义的。

甘谷话中还有很多保留自很早时代的语音现象，例如甘谷话称代此人为 [ts₁⁵¹kuai²¹⁴z₂en] 当是“之个人”。“之”为近指代词，在《庄子》中“之二虫又何知”里得到确认，显然，甘谷话是对古语的继承，只是在甘谷话中 [tʂ]、[ts] 不分，所以这样读。“器，语声”（见《说文解字》），甘谷话至今仍然以此为应答语声。这也是不多见的。词汇方面的更多，因为不是我们的研究主旨，我们在此不再细述。

总之，我们的意思，是想通过这些现象，指出在语言发展历史上，一些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可能存在着（因为缓慢而存在着、保留着）比较古老的材料。甘谷境内的朱圉山是这一区域——也即是秦始皇先祖最早所到的区域地标，它是秦汉语言可能较好地保留此地的一个地理性标志：首先，秦先祖在这里生活过；其次，甘谷境内有著名的西山坪遗址，那里有极其珍贵的文物证明，这个区域是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尤其是秦早期富有高度文明的区域，保存古老的语言标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片神奇的土地，就是古冀戎的地方，也就是秦武公征服后命名为冀县的地方，它和礼县大堡子山所证明的文明，和天水“木版地图”共同支撑起了古秦文明的核心。

我们潜意识里还想说明的是，我们基本确认，甘谷话来母字分读为 [tʂ] 与 [l] 两个声母的情况，应该是确认秦早期文明区域的标杆之一——这是一个判断标准，这也是汉代《白虎通义》给予我们的启示和证据。

我们还设想，在经过认真调研之后，设立一个秦早期文明区域认定的语言学标准体系，前期主要是语音方面的。比如在这个区域里存在的 [tʂjv]（租竹）、[tʂ ‘iv]（出租）、[ʂjv]（书酥）、[jv]（如耳）（这些音素还可以继续组成更长的音节，如 [tʂjvaŋ]（庄壮）、[tʂ ‘ivaŋ]（创撞）等），就可能作为判断是否是古代某个时期语言的标准或依据，也就是由此确认古代一种文明现象的共同创造区，比如秦早期文明区域。

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我们应该对古代一种语言现象做更加微观而系统的研究，以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个语言现象在长时间的存在过程中的生存状况，例如我们所研究的来母的生存状况。这样的研究，可以通过不同区域的语言研究者为古代汉语整体研究提供更加完备的现代方言标本。因为有很多方言材料可能很有价值，但可能没有人了解，甚至过了些时间它在这个方言里也消失了。那是极其可惜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比如天水话称“癞蛤蟆”为 $[kaI^{55}xuo^{35}mA]$ 就是如此，现在已经很少有年轻人知道了。

我们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本态度上进行的：首先，用甘谷话现有的语音材料作为证据，来证明秦汉时期一些特殊语音现象，有很强的可信度；其次，甘谷话在一系列语音现象上，保持着十分规整的队形，与汉、唐（宋）语音的对比中，表现出很强烈的规律性，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和认识角度；再次，甘谷话中还有大量的古代语音材料供我们深挖细磨。

我们也十分重视先贤们的研究及其成果，我们努力吸收他们的成果。所以，我们的这个研究，其中有大量的前人贡献为我们作支撑。前人的争论，因此很自然地对我们的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可是我们还是努力用事实去说话，用事实来证明我们的认识，这一点坚定地贯穿于全过程。我们认为，本成果（如果是个成果）最大贡献，还是在一些材料的挖掘上和保存上。我甚至想，将来也许有学者会彻底推翻我们的成果，但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却肯定对他有利。如果是这样，它就有贡献。

在我们自己看来，本成果有三个方面可以作为贡献：

一是提供（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方言材料。这些地区的方言变化很快，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车轮下，它们的生存越来越困难；

二是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时，从材料的角度进行了比较和梳理，这让这些材料从散乱变得有规律，而这样的一些材料上的归队，可以为其他学者提供一些相对容易得到的半成品，作为论据为别的研究作出贡献；

三是围绕这个研究，带动了对其他问题的研究，新研究肯定会因为这次的研究取得方法上、材料上的支持，也自然会因此产生更加全面的研究